

# 宋庆龄与“伤兵之友”运动

朱玖琳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第 389-395 页。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的积极行动，不仅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缓解了她与家人之间的长久隔阂。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宋庆龄也与她久已疏远的家人重新团聚在了一起。1940 年 3 月 28 日，宋美龄在香港召集妇女团体开会，呼吁港人响应政府正在重庆蓬勃开展的征求 10 万“伤兵之友”的运动，宋庆龄第一个站起来予以呼应。

## 一、“伤兵之友”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伤兵之友”（以下简称“伤友”）运动的宗旨是作“为保土而流血”的负伤官兵的朋友，为他们提供医疗卫生等服务，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精神上安慰他们。1940 年，这一运动在重庆以征求 10 万“伤友”的形式达到高潮。

“伤友”运动源起于 1938 年 11 月长沙大火之后。1938 年 11 月 11 日，日军继攻占徐州、武汉之后，又占领了湖南重镇洛阳。日寇嚣张的气势直逼与前线仅 230 华里之遥的湖南省政府所在地长沙。12 日上午九时许，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文电。林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旋即又接到蒋限令一小时到的密电，云：“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sup>1</sup>张随即召集部署焚火事宜。由于蒋早在武汉弃守之后便在长沙亲自主持会议，确定“焦土抗战”方针，因此张已拟定以彻底破坏长沙为目的的焚火计划。湖南是伤兵集中的地方，当时全长沙共有十几个伤兵医院，均人满为患。<sup>2</sup>下午 1 时至 3 时间，张召见了伤兵

<sup>1</sup>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3 页。

<sup>2</sup> 见《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3-154 页。

管理处处长汪强等人。张问汪：伤兵“什么时候能输送完毕？”汪答：“16日能运完。”张当时还嘱托汪“最好能提前于14日运完，愈快愈好。”<sup>1</sup>但是，13日临晨三时许，敌人炮火未到，惊慌失措的军警竟误听谣言，擅自挨家沿户点火，长沙顷刻间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连烧三昼夜不止，死伤二万余人，这其中包括许多行动不便的重伤官兵。伤兵死伤严重与许多医院负责人临阵脱逃有关。在大火的前一周间，“医院的负责人许多弃职而逃，弄的伤兵流离颠沛”。<sup>2</sup>此次火起就是因为长沙南门外一疏于管理的伤兵医院不慎起火。当营救人员“在伤兵医院的瓦砾堆里找到不少还有一口气的伤病员”时，“活着的伤员无不破口大骂，要求严惩纵火首犯”。<sup>3</sup>劫后余生的伤兵被分批送往衡阳，他们历经风霜，状极凄苦。目睹惨状，衡阳人自发地组织起“伤兵之友社”，“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为伤兵服务。以后这一形式传播于大江南北数省，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其事。

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使日寇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痴梦落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期。“中国将独立，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必须尊重士兵，尊重人民。<sup>4</sup>然而就在这一需要全体兵民共同努力的关键时刻刚刚到来之际，便发生了长沙大火这样伤民心、泄士气的惨剧，实在令人不堪，蒋介石必须为政府挽回面子。

1940年，乘纪念“新生活运动”六周年之际，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伤

---

<sup>1</sup>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sup>2</sup> 《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7日。

<sup>3</sup> 《长沙文化城》，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sup>4</sup>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33、476-480页。

友”总社，并隆重推出征求 10 万“伤友”的运动。在 2 月 18 日的纪念广播演讲中，蒋说：抗战“已经到了成败存亡的最要关头”，“因为我们将士与全体同胞的牺牲和努力”，“所以我们在军事上，不单是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而且确实愈战愈强”。<sup>1</sup>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亲任“伤友”总社社长，他在 19 日的广播演讲中也强调民族精神是“对外奠定御侮图存的基础。”<sup>2</sup>

只有团结全国各民族、各党派的力量，民族精神才会在御侮图强中发扬光大。蒋介石把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归结为他 1934 年于南昌“剿共”行营中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基准——礼、义、廉、耻。与原先的纯粹封建说教不同，蒋十分识时务地根据形势重新解释了礼、义、廉、耻的意义。他说：“礼要进到严严整整的纪律，义要进到慷慨慨的牺牲，廉要进到切切实实的节约，耻要进到轰轰烈烈的奋斗。”<sup>3</sup>这一诠释无疑具有切实的进步意义。“新生活运动”本是借宣扬传统文化之名，行封建专制统治之实。宋庆龄曾评价“新生活运动”说：“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sup>4</sup>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因不合时宜而趋于没落。孔祥熙却在 19 日的广播演讲中，不顾事实，大谈“新生活运动”开展 6 年来的成就，竭力宣扬中华民族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如何进步。很显然，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六周年之际隆重推出征求 10 万“伤友”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振业已没落的“新生活运动”，继续为他的独裁政治服务。

的确，就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蒋一面称中国已经到了

---

<sup>1</sup> 《中央日报》，1940 年 2 月 20 日。

<sup>2</sup>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2 月 23 日。

<sup>3</sup> 《中央日报》，1940 年 2 月 20 日。

<sup>4</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179 页。

成败存亡的最紧要关头，一面又无视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战场是相持阶段主战场的重要作用，重显“剿共”面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 二、香港的征求“伤兵之友”运动

1940年3月前后，伤病缠身的宋美龄来到香港疗养，住进了大姐宋蔼龄的家。在姐妹的邀请下，宋庆龄也搬来同住。多年隔阂之后，三姐妹又一同聚集在一个屋檐之下，仿佛重又回到了亲密无间的少女时代。此时的宋庆龄对刚刚发生的反共事件还浑然不知，她完全沉浸在国共合作和姐妹团聚的喜悦之中。

3月28日，宋美龄在宋蔼龄寓所召集在港的妇女慰劳会、香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香港女青年会、儿童保育会、广州妇女青年会等妇女团体领袖开会，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也被作为妇女团体应邀与会。会上，宋美龄称赞宋庆龄“年来致力于襄助工业合作社与红十字会之发展，其努力之处，不仅为我人模范，且足以为我人效法。孙夫人对国际上宣传，尤为努力，使各国人士，对我抗战建国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有更深刻之认识。而影响所及，各友邦人士年来踊跃捐助我国以大量慰问品。”<sup>1</sup>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分发救援物资时，往往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遗忘”，因此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主要为这些地区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所竭力支持的工业合作社也带有同样色彩。所以宋美龄的公开称赞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作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兼“伤兵之友”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的宋美龄随后又说：“各团体已往之工作，已有良好表现。惟以本人之意见，今后各妇女团体应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向同一目标迈进。‘伤

---

<sup>1</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9日。

兵之友’运动，为一最值得赞助之运动，彼辈勇士为御侮而牺牲，为保土而流血，实属值得吾人钦敬，应各尽所能，加以协助”。<sup>1</sup>宋美龄言毕，宋庆龄立即起立致辞，对宋美龄“忠忱爱国，备致赞扬。并提议成立香港‘伤兵之友’运动会。以孔夫人为名誉会长”。<sup>2</sup>宋庆龄的提议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大家还决定由与会的7团体各派1人，共同组成常务委员会，由伍朝枢夫人何宝芳任主席。

为了粉碎敌人所捏造的宋氏家族弃国远避的谣言，3月31日，汪伪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三姐妹联袂同机从香港飞抵正在日寇狂轰烂炸之下的重庆。香港《大公报》称：“闻蒋、孙、孔三夫人为推广‘伤兵之友’运动，将赴前线一行。”<sup>3</sup>4月7日，宋美龄在私邸举行茶会招待两个姐姐。到会的有中外妇女界200人，蒋介石也亲自出面欢迎，堪为战时首都之盛会。宋美龄用中、英文次第致欢迎辞说：“孙夫人和孔夫人不仅是我的姊姊，而且也是全国姊妹们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也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今天，就在这里要求两位姊姊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sup>4</sup>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重庆《新华日报》详细报道这一欢迎会并刊登宋庆龄为该报的亲笔题词——“抗战到底”的同时，《中央日报》却把宋美龄专对宋庆龄的赞美词以及宋庆龄鼓励妇女参与民主政治的讲话均略去了。国共两党两份报纸各自的报道态度，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微妙性。

虽然宋氏三姐妹并不像香港《大公报》所称是为推广“伤友”运动来到重庆，但是对于征求10万“伤友”运动正进入高潮的重庆而言，三姐妹的一系列战地视察和慰问伤兵的活动无疑具有团结民心和鼓舞士气的

---

<sup>1</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sup>2</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sup>3</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日。

<sup>4</sup>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8日。

作用。4月20日，重庆的征求运动结束。“伤友”总社社长、征求队总队长孔祥熙在嘉陵宾馆宴请各征求队负责人。孔祥熙向与会者公布了“伤友”总社全体理事的名单，三姐妹均名列其中。宴会结束后，“伤友”总社召开了全体理事会议，“讨论今后进行事宜”。<sup>1</sup>

重庆的征求运动已经结束了，而香港的征求运动此时正渐进高潮。香港的征求“伤友”运动一开始是很零星的，香港新闻界也只是偶尔报道一下。自从宋美龄对香港妇女领袖发出吁请之后，整个香港的征求势头被带动了起来，香港新闻界连篇累牍地在要版予以报道，使气氛更加热烈。

4月1日，宋庆龄首倡的“香港妇女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妇女界委员会）正式成立。按照3月28日会议的原定计划，组织大纲规定：该委员会为7妇女团体（前已叙）的联合组织；委员由主席和7团体代表共8人组成；负责策动香港侨团组织分队，分普通队和个人队两种，由妇女团体和热心妇女组队；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审核、调查、设计、交际、宣传7组，7团体各领1组。<sup>2</sup>

就在妇女界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天，华侨教育会香港分会、九龙教育联合会共同成立“香港九龙学界‘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4月2日，香港华人文员协会、青年记者学会等团体联合成立“香港各界征求伤兵之友社推进社”。4月3日，华商总会赈济会成立“征求伤兵之友香港华商队委员会”；香港学生赈济会召开第一次征求委员会会议。以后陆续成立的还有“香港书业公会伤兵之友分社”、“香港基督教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香港树胶业总工会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港九工团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等等。截止4月16日止，参加侨团达60个以上。这其中有部分如华侨教育会香港分会、九龙教育联合会、华商总会赈济会等组织原已响应

---

<sup>1</sup>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21日。

<sup>2</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2日。

重庆，在港发起征求，只是影响不大。

短短十余日间，弹丸之地的香港便成立了数十个征求组织，并且各揽其事，这就给重庆方面的汇总、统计等工作带来了麻烦。于是，直接“领蒋夫人命”成立的妇女界委员会以正统自居，意欲统揽全局。主席何宝芳一再向新闻界表示妇女界委员会并不摈斥非妇女组织或个人，她希望“各界名流及团体学校分别屈就分队长，以期群策群力，成此伟举”。<sup>1</sup>妇女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还特别决定将征求范围加以扩大，修正原组织大纲的内容，将其中关于“妇女界”的名称，一律改为“各界”，负责组队的从原来的“妇女团体”和“热心妇女”改成“各界团体”和“热心人士”。但是由于各团体和个人队的名称前必须冠以“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的字样，压抑了其他团体的地位，所以应者寥寥。香港各侨团均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于是各组织之间、同一组织的各个分队之间步骤不一，行动混乱，有人甚至把征集到的捐款直接“汇往蒋夫人收”。为此，妇女界委员会特发表声明，所属各队必须将所征得的款项交财务组代收（500 元以上的中国银行可代收），由财务组统一缴解重庆总社，不得直接汇往重庆。妇女界委员会还特别解释了该会“伤兵之友”纪念证章的分发之所以延滞，是因为制造厂商同时接制其他团体的制章定单，因而一时间无法满足妇女界委员会的需要。

5 月 7 日是妇女界委员会原定征求截止日，该会与当日公布了征求结果，但同时宣布延后结束日期。妇女界委员会始终没有放弃统一各团体行动步骤的努力，但不再坚持统领权。在该会的一再号召下，5 月 16 日，领导香港征求“伤友”运动的 6 大团体——港澳赈济会、妇女界委员会、华商总会、港九学界委员会、港九侨工团体委员会、粤侨救济桑梓会举行

---

<sup>1</sup>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4 月 2 日。

联席会议，商讨结束办法。会议决定香港征求“伤友”运动统一于5月底结束，各团体自行登报公布征求结果，所收款项由重庆“伤友”总社核收，但须将数额通知港澳赈济会，以便汇编统计。<sup>1</sup>5月17日，6团体依次以“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港九侨工团体征求伤兵之友委员会、港澳赈济会征求伤兵之友队、征求伤兵之友香港华商队委员会、香港九龙学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粤侨救济桑梓会征求伤兵之友队”的名义联合登报，向香港公民公告会议情况，宣布运动结束日期为5月31日。

### 三、宋庆龄的态度

“伤友”运动之所以蓬勃兴起，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同时“伤友”运动蓬勃兴起之时，正是国共两党的关系自第二次合作后首次陷入危机的时候。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宋庆龄对“伤友”运动的复杂态度。对该运动本身，宋庆龄是积极支持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她正直的人生态度外，既有她对形势发展的正确认识，也包含了妹妹宋美龄的因素。但鉴于政府发动征求10万“伤友”运动的错综复杂的用意，宋庆龄在沉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宋庆龄就在上海交通大学内迅速筹建了一所伤兵医院。她十分关心伤兵的精神生活，自己出资购买唱机，并根据伤兵多为广东人的特点细心地挑选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唱片。她甚至身着护士服，亲自为伤兵服务。当时，宋庆龄曾请一位著名的外交官夫人帮忙物色一些人来为伤兵服务，结果这位夫人傲慢无礼地大声说：“这不可能！我们的姑娘都出身高贵，她们不能去医院照顾那些粗人。……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姐妹去做那种事，去和当兵的打交道！”宋庆

---

<sup>1</sup> 香港《大公报》，1941年5月17日



龄语气和缓但言词犀利地回敬她道：“我懂了，你们是要他们为你们去死，而不愿意他们和你们一起去死。”<sup>1</sup>

“伤友”运动蓬勃兴起后，政府宣传机构曾一再提到这一运动对改变人们对军人的态度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这是政府在故意混淆视听，倒置因果。事实上是因为人们改变了对军人的态度才促进了“伤友”运动的全面开展，而不是“伤友”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中国人轻视军人的确有历史渊源，但同时也是现实使然。当局投入大量兵力进行长年内战，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再加上国民党军纪涣散，经常骚扰百姓，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对军人有好感。然而军人为保土御侮而牺牲性质就完全两样了。自从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国民党政府在人民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民而战的军队自然会受到人民的真心爱戴。

为抗日的伤兵服务是举国拥护的事情，早已在精神和行动上成为“伤兵之友”的宋庆龄自然不会反对，因此她第一个站起来带头呼应宋美龄的吁请，并对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被视作香港妇女团体之一未提出异议。

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代表保盟参加了妇女界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作为组成该委员会的7团体之一，保盟负责审核所有帐目。由于一切捐款均上缴重庆总社，不得作为行政开支，保盟特意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开支，此举不啻为雪中送炭。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保盟以“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大同盟队”之名，由廖梦醒代表，请领了100份“伤兵之友”证章。宋美龄在香港呼吁发起征求运动的目的“系在将此种运动推广于海外而已”。<sup>2</sup>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是一个努力于对外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机构。宋美龄在3月28日会议上首次公开赞扬

---

<sup>1</sup> 埃德加·斯诺：《她为中国民众而战》，尹君生、安危著：《埃德加·斯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sup>2</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6日。

宋庆龄的保盟事业，除了表示一种姿态外，无非也是想通过保盟向海外募款。这是一件与国有利的事情，宋庆龄没有使宋美龄失望。1940年5月15日，发行海外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6期在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刊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并以《“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蒋夫人盛赞孙夫人》为题，详细报道了3月28日会议的内容，以及成为“伤兵之友”的具体方法和奖励形式。<sup>1</sup>

“伤友”运动经层层推动，在1940年4月至6月间，在香港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团体之间甚至暗中较劲，一比高下。保盟没有加入这一无谓的竞争，从5月8日香港《大公报》公布的结果来看，保盟募得捐款3万港币（合10万国币），在11个团体队和10个人队中名列第十。但这并不说明保盟对为伤兵服务不积极。由于分到共产党统治区的救援物资极少，因而保盟一向“特别致力于帮助华北和华中游击区的伤员和战争受害者”。<sup>2</sup>保盟不可能因为参加“伤友”运动而影响自己的主要任务，宋庆龄要把援助之手伸向“需要最迫切的地方”。

《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评价征求10万“伤友”运动说：“我们认为这是抗战现阶段巩固后方加强军民合作最紧要的任务。”“救护伤兵帮助伤兵的工作是须要广大民众来参加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一点，便是对于这一工作，政府当局应该更积极担负起重大的任务来，……光靠民众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非有政府来积极主持不可。”<sup>1</sup>

政府“缺乏”“积极主持”伤兵工作的资金，但同时却不惜重金“剿共”。对于正在屡屡发生的反共事件，宋庆龄通过重庆之行已有所耳闻。不久前还沉浸在国共合作、姐妹团聚的欢愉中的宋庆龄陷入了沉思。在重庆没完没了的欢迎会上，宋庆龄常常感觉自己是个摆设，于是“孙夫人言

<sup>1</sup> 见吴景平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5页。

<sup>2</sup>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语不多”或“孙夫人含笑不语”之类的话常常见诸报端。5月9日，宋庆龄重又回到香港。这一次，她令妹妹失望了，未能如其所愿在重庆长留。

宋庆龄回到香港时，香港的征求“伤友”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是和在重庆时一样，宋庆龄没有就征求10万“伤友”运动向新闻界发表任何讲话。5月19日，宋蔼龄在私邸开茶会招待各妇女界领袖，对她们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中“努力工作之精神，极表敬佩”。<sup>2</sup>宋庆龄亦参加了茶会，但她只是应邀到场，在会上始终未置一词。次日，在向香港新闻界发表的《渝行观感》中，她指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方面，“自抗战以来，已有诸多进步，但尚未达到应有之程度”，“一部分负责人员视抗战建国纲领为具文”，“对于主义，空言拥护者不乏其人。对于抗战中加强改善民生，尚少明确具体之实际办法”。宋庆龄回港后，不断有人就反共事件询问宋庆龄。宋庆龄一面指出这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一面痛斥“少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国共关系恶化的宣传，“实妄人也”。<sup>3</sup>

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的征求“伤友”的运动相继落下了帷幕。就对抗日战争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言，这一运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将政治阴谋加诸这一运动，从而致使宋庆龄由原来的积极支持转向沉默。即使这样，她也没有让保盟停止行动，只是保盟不像香港的其他侨团那样盲目跟从政府。针对国民党政府重又出现的反共苗头，宋庆龄婉转地进行了批评，她殷切希望国共两党能放弃党争，团结一致，御侮图强。

“伤兵之友”运动从侧面折射出当时国共关系的微妙性，宋庆龄对“伤兵之友”运动的态度则反映了她在这一微妙时期的立场。1941年初，更为严重的反共事件——“皖南事变”爆发了。宋庆龄得知后立即与何香凝

---

<sup>1</sup>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1日。

<sup>2</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5月20日。

<sup>3</sup> 香港《大公报》，1940年5月21日。

联名电斥蒋介石，《保盟新闻通讯》也第一个向国外披露了事件的真相。  
为此，她与家人的关系又一次陷入僵局……。